



核心阅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规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文化身份。中国共产党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从而使传统文化为中国实践所用。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作。这一论述深刻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传承民族精神血脉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本来、开辟未来的文化情怀与价值理想，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中华文化的文化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深度融合的当代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 曹润青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规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文化身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以其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著称于世，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民族性格，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天不变，道亦不变”，历史上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着高度自信与认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带来的近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及中国主体性的失落，丧失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在强大的西方面前，失去了自信，失去了界定自我与世界的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在近代获得独立的开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更新自我的实质性起点。在共产党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先后为了挽救中国而矢志奋斗，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并没有被真正动员和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鲜血洗刷了屈辱，焕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磅礴力量。中国人彻底意识到，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能够自主、自立、自强地战胜任何困难。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在抗战中得到了空前的锻炼，

并随着抗日和内战的先后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而达至顶点。民族尊严的获得和民族力量的提升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根本原因与根本动力。可以说，正是因为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使中国人民的坚毅、勇敢、团结再一次在历史中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共产党真正坚守了民族立场，在根本上守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实质性地保护了民族的自立，维护了民族的团结，释放了民族的力量，从而真正保护了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生命。

立足当代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实践所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思乡的怀旧与抒情，更不是不分对错的全盘承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就秉持着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种立场一方面破除了对传统的因循守旧，极大释放了革命需要的动力；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调动传统文化的资源，使其为革命斗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形态和机制进行揭露和斗争的同时，极大调动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动员能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

山、团结一心、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传统文化为整个民族奋发图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最终历史性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中国实践的深刻把握和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时代下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放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整个发展脉络中去理解，打通了古今之间的联系，使中国历史不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前后相续的整体，而成为中华民族生命发展历程的一个完整体，这就使得产生于近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内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展开。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单纯地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而弘扬传统文化，而是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部出发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获得中华文明持久广泛而深沉的滋养。

中国共产党对待和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业已表明，只有

立足时代的特点和要求，融通传统文化与中国实践的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其生命力才能真正被激活。那些认为传统文化只能照搬、要求传统文化必须“原汁原味”的做法在将传统文化供上神坛的同时，扼杀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就熟知“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在历史上，随着历史客观条件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实现着自我的发展。文化只有活在当下、活在现实，活在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行中才是真正地“活”着。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展开必须在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走出古典形态的框架，走出“照着讲”的巨大历史惯性，在时代问题的激发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水乳交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接着讲下去”。

面向世界开放发展

真正有效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必须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近代中国在西方面前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与文化独立性，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亦步亦趋、极为被动。中国思想的大门洞开，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在中国轮番登场，失去文化主张的中国无力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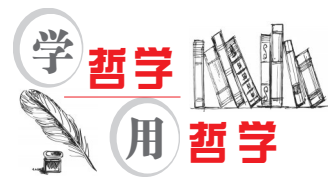
这些思潮作出客观全面的评判，中国社会呈现出普遍的思想迷失和价值失守。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立场的持守是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坚持，是在世界范围日趋激烈的民族国家竞争中，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推动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促进不同文化间友好交流互动、推动世界文明更好发展的根本保障。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不盲从他人，而是以中国的实际、民族的利益为衡量尺度，通过向世界学习，真正将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化为己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向世界各国各民族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而寻找到的一条既适合中国实际又体现现代化要求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的历史性产物，是中国为丰富世界文明作出的突出性贡献。作为世界文明交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始终反对敝帚自珍、一叶障目，而是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文明多样并存的格局下“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实现世界文化的大交往与大和谐。

理论阐释

从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起

□ 张西立



冯友兰先生根据他对中国哲学的体悟，曾把“人生的境界”做了“四等”之分，即“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究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在此，笔者无意评判冯先生此说之长短，只就其有关“哲学”对于人生意义的重要性略作展开。

从镌刻在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认识你自己”开始，“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学说。在冯友兰那里，一个人“自我意识”的有无及其强弱，恰恰是反映或决定他的人生境界之高低的关键——“自然境界的人生不需要对人生有任何理解 and 自我意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需要有一对人生的理解和自我意识；天地境界需要的人生理解和自我意识则最高”。那么，作为现实的人，如何才能摆脱自然和功利层面，逐渐提升到道德直至天地之境呢？冯先生认为这就是“哲学的任务”——“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对于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对于哲学提升人的思维能力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给予深刻揭示，恩格斯就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人生境界问题不可回避。如同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同样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确有不同人生境界的区分。对于人生境界问题的关注，正是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内的一定哲学研究的对象。柏拉图所要追求的则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之境，佛教徒致力修炼的是彻底摆脱尘世的“涅槃”之境，儒家士大夫心

中的最高目标就是“圣贤”之境。西方新教伦理并不一般地反对禁欲主义，它主张通过商业活动等经济的方式实现与“上帝”同在的“永恒”之境。如前所述，冯友兰则把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生境界的内在追求归结为“天地”之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全部世界观的核心和灵魂，不仅没有回避人生境界问题，反而给予了彻底的回答。马克思在承认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同时，也深刻指出，由于人在本质意义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因而人生价值问题的存在及其实现最终都是一个“实践”问题，即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日益自觉地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加以改造，才能真正赋予人生以最大价值，人生的境界也才能逐次提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的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不仅成为为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入生价值坐标，实际上也为全体社会成员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生境界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的“心智”水平。按照冯友兰的理路，人生境界的区分，不在于他的财产多寡，也不在于他的地位高低，甚至不在于他的能力大小，而是在于他的“心智”水平。这里所讲的“心智”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谓的纯粹主观力量或“绝对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程朱理学推崇的“心性”，它的真实内涵是包括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所应该拥有的理想信念、教育水平、思维方式、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各种内在精神状态的总和，本质上体现为一个人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和体认能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人们摆脱“自然之境”进到“功利之境”，继而提升到“道德之境”，最后通达天人合一的“天地之境”，实质就是从“自在”向“自为”的发展，也即从受制于规律的“必然王国”向着不断认识和利用规律的“自由王国”进发的过程。必须看到，人类整体“心

智”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跃迁而逐步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越发达，社会形态越是先进，人的整体“心智”水平也就相对更高一些，从而使得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认识也就愈加科学和理性。我们不排除历史上个别人物，如伟大思想家们以及社会上少数先进分子的“先知先觉”，但是总体上看，人生境界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如同社会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既不能超越阶段流于空谈，也不应无视潮流自甘落后，而应时刻秉持一种战战兢兢、惕息不已的恭敬态度。

共产党人修养问题的要害在于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生境界问题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这里，则演化为“修养”之道。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拿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套用到共产党人的修养中来，因为共产党人天然是由“特殊材料”打造而成的，作为整体，共产党人是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和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同时也应看到，任何事物的“整体”都不是“局部”的机械相加，而是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化学”作用的结果。任何“局部”要想成为这个事物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游离于“组织”之外，也必须不断地赋予自身以“组织”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反观现实，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不在少数，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党的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待于从根本上进行解决。这些都需要我们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予以审视和把握，特别是从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搞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的角度加以深入研究。

无论是就共产党的自身组织建设，还是就每一名共产党人的个人修养而言，要害和关键都在于结合形势和任务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要注意学懂弄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不仅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克敌制胜、赢得未来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全体共产党员用以深刻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升思想觉悟进而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中国人民何以

□ 范景鹏

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最为完整的、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能够对中国人民起到巨大动员、鼓舞和指引作用，给中国先进分子注入了强烈的革命精神，给中国的无产阶级注入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就会形成精神主动的强大理论动力，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形成了领导中国人民精神主动的坚强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旗帜鲜明地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这使得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为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精神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一个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能够真正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责任，成为任何敌人无法压倒的新生政治力量。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形成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

可战胜的力量，带领中国人民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把历史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进程、前途和命运。

红船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主动的来源。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应运而生，由此而生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形成了中国人民精神主动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由它孕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党性品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价值、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对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继承革命年代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培育而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时期精神主动的生动体现。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培育形成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保持精神主动，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专家视点